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研究

范开明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是军队基层单位中的“微型社会磁场”，是一种对军事组织的整合水平有重要影响的小群体现象。本文以有着一至五年军队生活体验的男性青年为基本对象，就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角色构成、分布范围、内部互动状态、核心角色的形成与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首例较为细致的描述性研究。

作者：范开明，1953年生，南京政治学院上校教员。

凡有军旅生活经验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军队不仅是一种有着诸如军、师、旅、团、营之类正式结构的大型社会组织，还是一个充满各类非正式角色和种种“个人交往渠道”的复杂社会网络，后者就是在其他社会组织中也广泛存在的所谓非正式结构中的首属群体。

军事实践表明，这类社会网络中的细胞成分之一——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对军事组织的整合状态具有多种影响。正因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军事社会学界对这类小群体现象一直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并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中期以来，军人小群体现象也成了我国社会学界关注的课题，有关的理论分析文章在报刊上时有所见。但是，在系统周密的实证性研究方面，我们同国外学术同行相比还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为将这方面的学术活动引向深入，我们以进入现役1至5年的男性青年为基本对象，就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角色构成、分布范围、内部互动状态、核心角色的形成与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首例（样本总规模：N=2580；时间跨度：1990—1995）较为细致的描述性研究。

一、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一般特征

1. 群体的规模差异与角色结构

青年军人，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指不超过28周岁（排职指挥员的最高服役军龄）的现役人员。处在这个年龄的军人90%为18至23周岁的士兵，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角色阶层，在我国国防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故在此项研究中，我们将视点放在这个社会类群上，而将平均年龄高于士兵、人数比重不大的初级军官和初级军士列为同龄段异组因素。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则是指分布在青年军人中间的、以某种较稳定的亲密关系为纽带的非正式群体。这类小群体通常都具有初级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如成员间的社会互动频率相对较高，内部存在一定强度的群体认同，有速度较快、深度较大的信息沟通和较为强烈的互助期待，往往会发育出有多种功能的核心角色等等。具有良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发育的军队基层单位，其内部人际关系会形成能够显著增大总体组织强度的小型颗粒结构，后者对青年军人在

包括巨大风险情境的各类军事活动情境中完成群体协作,有着极高的组织价值。

同地方上的青年人一样,我国的青年军人,特别是那些处在青春期“盛季”的战士,对人际交往中的亲密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情。根据我们的多次抽样研究,自称在军队生活中介入了可在其中“谈天说地,商量问题,互帮互助,倾吐苦恼,分享欢乐”的“朋友圈”的青年军人,在样本中占有绝大的份额,比率达到 95% ($P < 0.05^{**}$)。

在亲密型人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设置了互动频率因素作为识别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第二标志,并对这种小群体的规模等级做了如下的数量界定:小型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部具有 1 维至 5 维的高频次互动关系,成员数量在 2 至 6 人之间;中型群体,内部具有 6 维至 10 维高频次互动关系,成员数量一般在 7 至 11 人之间;大型群体成员人数在 12 人以上。

从表 1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以小型结构为主体,其人员比率几近介入“朋友圈”者的四分之三。

表 1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

规模类型	百分率	累积百分率	规模指数
1、小型	74.1	74.1	100
2、中型	18.3	92.4	25
3、大型	7.6	100.0	10

若以小型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为规模指数的基准值,那么中型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占有的人数仅为其 1/4,大型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则更少,刚刚达到它的 1/10。这样一种分布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基本上属于正常。

我们对青年军人友伴群体规模类差的定性区分得到了抽样调查结果的支持。在小、中、大三个等级之间,人员数量存在明显的规模差别。小型群体包括双人伴群到 6 人群体 5 个次级类型,平均人员比率为 14.8%,其中 3 人群体人员比率最高,占整个样本的 19.2%。最少的为 5 人群体,人员亦达到 11.8%。进入中型群体的台级后,平均人员比率急剧下降,仅为 3.7%,其中单项比率最高的 7 人群体人员比率也才达到 5.3%。到了大型群体的范围,这种比率仍以同样速度下降,低至 0.8%。如果做出规模分布图形,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以 3 至 4 人为一般规模水平的特征。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角色构成是一个可以从许多角度加以分析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选择了参与者的军人身份和社区文化背景这两个侧面进行考察。

表 2 军官、军士对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涉入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 结构差异	群体规模 (%)		
	小型	中型	大型
1、“纯士兵群体”	68.2	65.5	65.7
2、军官成员未超过群体 总数 1/3 的	91.0	95.1	94.8
3、军士成员未超过群体 总数 1/3 的	87.8	93.4	96.5

不难看出,成员都是士兵的友伴群体在三种规模中均占有突出地位,人员比率皆在 2/3 左右。大量纯士兵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存在一般说来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大家知道,军队士兵是同质性甚高的阶层,他们在年龄、文化水平、生活阅历、军人待遇等方面都彼此相近。受这

些因素制约,士兵在本阶层内发展个体间的亲密关系要比跨阶层建立同类关系容易得多。

表2还反映军官、军士同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之间的直接联系较弱。从资料上看,不论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是大是小,涉入的军官和军士在人员比率上都有限。之所以如此,通常并非军官与军士缺乏人际交往的技巧,而是他们不能适应友伴群体的一项“基本规则”——参与者在友伴群体情境中要放弃各自的正式角色。对士兵来说,完成暂时放弃战士角色身分、改为伙伴或密友规范的角色转换几乎毫无困难,而军官和军士一般都负有某种指挥、管理责任,其角色意像同士兵大为不同,要在下属面前将之完全放弃很可能导致一系列角色紧张与角色冲突,结果既影响正式角色的权威,又危及个体自身的心理平衡。所以,相当数量的军官与军士都设法避免涉入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以防陷入可能带来某种苦恼的两难选择情境。这种现象决非军队所独有,在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方组织中,类似的情况亦十分普遍。

既然垂直角色关系和角色的阶层差异阻碍了军官与军士的充分涉入,以士兵为主要成分的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相对封闭性便越发显得突出了。在指挥角色的社交网络之外存在着十分活跃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行为调整系统,无疑增大了组织管理的复杂性。军官要想有效地影响和节制它们,就须对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分布、结构、关系强度、功能性等情况有较充分的了解。显然,这是一种需要尽力“与士兵打成一片”的工作。

接下来,看看“同乡关系”的影响。

我们知道,纯粹的单缘性友伴群体是罕见的。这个论点并不排斥相同社区文化背景在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发育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独特作用。当许多方面都很相似的青年人突然远离已十分熟悉的首属群体环境,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个相当陌生的军旅世界时,最有助于他们摆脱孤独并建立个人间亲密关系的因素莫过于乡情乡音了。“同乡”非常自然地成了容易引发认同的既有角色。

随着军人生活的延续,多数青年军人或迟或早都会超越同乡关系的社交捷径,逐渐拓宽人际交往的范围。同时,在军旅生活初期享有“先机之利”的同乡关系仍会保有一定的优势。

在我们的抽样调查数据中,没有同乡角色的友伴群体极少,人员比率仅为2.7%;另一方面,“纯同乡群体”也不算多,总计才达到样本的12.7%。这种友伴群体多数为小型的,人数不超过6人。再退一个档次,将同乡角色达到2/3以上的群体也并入进去,其总量亦未高于28%。且仍以小型群体为多。统计分析也显示,在友伴群体规模大小与同乡角色多少之间有着较明显的负相关($\gamma = -0.39, P < 0.05^{**}$)。

依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到三个结论:第一,同乡群体在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发育中确有突出影响;第二,友伴群体的规模越小,可能具有的同乡色彩相对越为浓厚;第三,同乡成分甚高的友伴群体数量并不很大,故也不宜过高估计共同社区文化背景这一因素的作用。

2.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在正式结构内的分布

由于友伴群体不是军队的正式结构成分,其成员的分布状态虽不可能完全不受军队正式结构的制约,但在自成一体这一点上还是高度自主的。

从逻辑上讲,每个军人都可以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寻求亲密关系,并利用现代科技提供的多种便利条件,维持同对方的频繁交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凭借远距离通信手段得以存在的军人友伴群体毕竟有限,更多的还是有赖于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关系大体协调的军事社区,如基地、军营、校区等等。置身于同一社区或相邻的青年,拥有彼此面对面交往这个至关重要的优越条件,可以相互传输含有语言、表情、身姿符号和感觉与情绪内容非常丰富真切的信息,还

能进行各种样式的互助合作。因而,我们可以把军事社区视为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基本分布区域。

从军事组织整合的角色观察,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最小社会分布空间应为班排一级小单位的所属范围。

或许有人会想,友伴群体若以这类范围为界,将更有益于组织的整合控制。但现实同这种意愿距离很大。根据调查,有 43.8% 的青年军人称自己在本班内没人友伴群体圈中的密友,相反的极端情况也为数不多,只有 2.1% 的青年军人说自己的个人朋友都是本班成员。显而易见,同班长权力范围完全吻合的非正式群体数量微乎其微。

如果再看一看成员为同班青年军人的比率未超过该群体 1/3 的分布状况,“外向”的印象会更为深刻。依群体规模的小、中、大级序排列,上述的低密度比率分别为 80.6%、91.3% 和 96.5%。据之可得出如下判断,基层班、排一级“法定边界”对青年军人非正式群体的实际组合没有重大影响。

那么,连队一级单位的社会空间范围对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影响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连队是现代军队中极重要的组织层次。它们不仅是基本的战术单位,而且还是人际关系网络相当复杂的小型社会。特别是对服役期不长的青年军人而言,连队堪称军旅生活的主要舞台,当然也是他们发展个人友谊的基本环境。连队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在性情、爱好、交往取向、个人才华、社会阅历、人格特征上呈现出有利于交友选择的多样性。连队吃、住、行等军人生活的场所与节奏又相当统一,直接影响着青年军人社交活动的时空范围。毫无疑问,连队生活的这类特点必然会影响到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发育。

我们的调查对象有 42.9% 的人反映,他们参与的友伴群体有半数以上的成员虽不在本班,但却在同一连队。如果加上称半数成员在班内的,比率已超过样本的一半,达到 55.2%。这些情况可以确定我们的一般经验,即连队组织的确是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生存活动的重要社会组织环境。

调查结果还显示,友伴群体的规模差别同它们在连队的分布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它们是大大小小,其多数成员同处一个连队的都在本型的五分之二左右。

也应看到,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方式为青年军人进行跨连队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战时难以寻觅的多种便利。这使为数可观的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在成员分布呈相对弥散状态,其关系链已超出连队层次,进入营、团甚至更高的正式结构。此类情况在我们的样本中近于 50%。

改革开放以来部队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上述比率是具有真实意义的。实际工作还一再启示,这种空间跨度较大的小群体既支持着我国军事社交生活的活跃,磨炼着年轻人的社交才干,同时也使我军基层人际关系变得较为复杂,增大了日常管理和有效引导的难度。

二、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的人际关系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即友伴群体成员相互联系的深浅强弱,是反映这类群体内部状态的重要指标。友伴群体的内部整合水平较高,它作为一种“微型社会磁场”而产生种种群体效应的潜能就越大。人类活动的历史表明,许多在个体孤独状态下难以发生的行为,在较紧密的群体状态中却往往容易进入现实过程。

刻划军人友伴群体内部关系紧密程度的方法有多种,我们选取的是描述相互投入差异及

其在群体内相对比重的多维结构。

1. 群体内信息与情感沟通

友伴群体的一大特征是它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较强的封闭性,最易测度这方面情况的是其成员信息沟通的可达深度,具体可分作三个层次。

一为个体对策参与。所谓个体对策参与,是指成员间为应付个体生活中的难题或挑战相互提供背景性信息和对策建议的互动行为。要能做到此种介入,显然必须有一定的亲密关系作基础。因为在信息沟通过程中,当事者一般难免透露他对若干相关对象(包括个体与群体)的私人评价和交往态度,参与者提供的对策建议也会含有较强烈的情绪色彩与偏倾取向。这类体现“私谊”的互动有时同组织环境中的某些规范或他人偏好处于竞争状态,内容一旦传出,很可能会影响既有的人际交往,并带来一连串不愉快的后果。所以,某种程度的相互信赖是个体对策参与的重要前提。

我们在研究中注意到,青年军人在友伴群体内部的个体决策参与在总体水平上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状”结构。表3的A项介绍了有关资料。

若忽略该类群体的规模差异,可见高密度反映(即友伴群体中经常介入个体决策者的人数占其群体规模2/3以上,同类强度在25%至66%之间的为中密度,强度在25%以下的视为低密度)约为样本的1/3。低密度反映比率略低,达25.8%。中密度反映是该项的重心,近于样本的半数。如果以高密度反映水平为规模指数(SI)的基准值,亦可确定后两者的水平,具体为100:151:88。这样一种结构是否亦能代表小、中、大三类群体的分布特征,统计分析的回答是否定的。表3显示,大型友伴群体的A项结构呈金字塔形,密度越高,比率越小;中型规模的结构略似于总体分布结构,大头也在中间层次;恰成对照的是,小型群体的分布呈头大尾小的倒金字塔形。这种不同的分布形态告诉我们,规模相对较小的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部的个体决策参与活动更为活跃。其中,成员在2至6人之间的小型群体拥有的这种人际沟通条件十分引人注目——中、高两种密度之和达到82.7%。

从军事组织行政管理角度看,以上数字意味着对一个青年军人角色行为的调控引导,很可能引发其他军人或明或暗的介入,后者提供的对策性建议因有亲密关系的基础,故常带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制约当事人角色行为调适过程。能否恰当地驾驭这种群体力量,直接关系到基层整合工作的实际效果。

另一层次是深层情感参与。在友伴群体成员之间经常相互透露高度个体性的情感生活信息,这是友谊较深的标志。能向对方讲述自己的恋人或求偶目标,详细谈及家庭亲人的秉性爱好与优长缺陷等,都需要更高的信赖感和相容性。

我们区分的第三层次是个人隐密参与,指的是双方之间的高度信赖,以至于能够相互吐露极敏感的个人情况。这类信息或同社会基本评价直接相关,或涉及个体的重要行动方向,或同社会规范有明显抵触,都属于某种不可让“外人”知道的“难言之隐”。

这两个层次是军事组织非正式的高效信息传播网络(俗称“小道”)的识别成分。表3中B、C两项分别反映了它们的分布结构。二者在总体水平和规模分级水平上都比较接近,基本上呈字金塔状。这一特点随着友伴群体的增大而愈趋突出。

最值得注意的是高密度反映所占的比率。它告诉我们,我军基层最少也有25%的青年军人处在内部关系紧密度高的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影响之下。要做好青年军人的各种思想政治工作,显然必须时刻清醒地意识到青年军人的这一重要特点。

表3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的信息沟通状态

密度 分层	沟通 层次	总体水平 (%)	规模指数 (SI)	群体规模差异 (%)					
				小型	(SI)	中型	(SI)	大型	(SI)
高密 度	A 较深	29.5	100	42.1	100	21.1	100	10.3	100
	B 很深	19.6	100	26.1	100	15.0	100	10.6	100
	C 极深	23.1	100	34.1	100	14.9	100	7.5	100
中密 度	A 较深	44.6	151	42.6	101	49.0	232	39.6	385
	B 很深	34.5	176	32.5	325	37.4	49	33.3	315
	C 极深	36.6	158	34.6	102	38.1	265	38.9	515
低密 度	A 较深	25.8	88	15.2	36	29.9	142	50.0	485
	B 很深	45.5	234	41.5	159	47.6	317	56.1	525
	C 极深	40.4	175	31.4	92	47.0	315	55.7	723

2、友伴群体中的两类互助行为期待

及时热诚的互助是友伴群体内亲密关系的体现,也是维系这种关系的必不可少的人际交往活动。

在古代,中国社会各阶层都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类格言持肯定态度,相应的行为期待自然也非常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社会交往关系之中。时至今日,中国社会虽已屡经变迁,昔颜大改,但令人忧喜参半的重人情、讲回报的古风仍旧为世人所传承,并在各类友伴群体中保持着十分可观的影响。我国青年军人多来自农民、工人和国家中下级公务员家庭,可以说从小就在充满这种文化传统的环境中饱受熏陶,再加入伍后我军同志认同以及多种政治教育直接间接的强化,士兵在注重友情的友伴群体交往中必然会怀有较强烈的互助意向和相应的行为期待。

我们在互助行为期待方面选取了三个指标。

第一个是物质互助期待,情境设置是让被调查者估计需要时能够借钱给自己的圈内朋友数量(见表4中的D项)。这种互助一无利息,二无偿还契约,三无见证人,要能在交往中顺利发生,离不开双方的相互信任和理解,而人际交往中的亲密关系恰能提供这种互动基础。

表4中的D项资料表明,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确是物质互助行为的优良发生环境。就总体水平论,高密度反映接近样本的80%,低密度反映低于15%。以不同的群体规模论,中、小群体的中密度以上反映皆达到88%,而规模较大的友伴群体的这一反映也超过了75%。可以判断,在各种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之内,同多数成员间形成了有较高物质互助行为期待及此类活动可能性的关系网络的青年军人至少超过了总体的半数。

更深层次的指标是风险互助期待,它是友伴群体成员对相互间在必要关头提供有较高个人风险的互助行为的角色期待。日常情境中,物质互助对施助者的影响一般只局限在某些个人利益的让渡,而那些发生在风险情境中的互助行为则有可能给施助者带来某种严重后果,危及其个人的健康、事业发展甚至生命安全。军人是职业风险很高的角色,战时终日与死神相伴,和平时亦常涉险履危,对风险互助有较高需求是不难理解的。

友伴群体的亲密关系具有激发风险互助行为发生的功能。这一方面往往有效加强了军事组织中有关战友互助互救的角色规范,促进了军队的整合,如战争史上大量事实已表明的那样;另一方面,也可能使某些离轨行为获得一定的人际条件。我们并不准备在此详细讨论上述差异及其原因,只是考察一下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发生风险互助的潜在可能性的大小。

风险互助期待可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次级指标。一个是“他—我”方向的,即被调查者对群体内有关他人的风险互助期待;另一个是“我—他”方向的。即被调查者自身投入风险互助的行动意向。

表 4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的人际吸引状态

密度 分层	互助行为 期待	总体水平 (%)	规模指数 (SI)	群体规模差异 (%)					
				小型 (SI)	中型 (SI)	大型 (SI)	小型 (SI)	中型 (SI)	大型 (SI)
高 D	物质互助期待	57.9	100	63.4	100	52.8	100	56.2	100
密 E	“他—我”风险互助	43.1	100	54.5	100	33.2	100	31.1	100
度 F	“我—他”风险互助	49.6	100	58.8	100	43.1	100	35.1	100
中 D	物质互助期待	27.8	48	24.5	39	34.9	67	20.6	37
密 E	“他—我”风险互助	32.2	75	29.7	55	38.6	116	24.2	78
度 F	“我—他”风险互助	30.0	61	30.5	52	41.7	97	33.4	95
低 D	物质互助期待	14.2	25	13.2	21	13.0	25	24.2	44
密 E	“他—我”风险互助	24.7	57	15.9	29	28.3	58	41.8	13
度 F	“我—他”风险互助	15.4	31	18.7	18	15.3	36	31.6	90

表 4 中 E 项和 F 项显示,居压倒优势的分布结构呈倒金字塔形,或者说随着反映强度的增大,个案数量基本上也呈增大趋势。这样的分布意味着在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普遍存在着较强烈的风险互助行为期待和相关的义务感。特别是规模在 2 至 6 人之间的紧密型小群体中,自称可在重大关头相互依托并认为值得为之承担风险的人数比率近于 60%。而关系相对松散的小群体这种期待明显低弱,强度仅在 20% 以下。

角色行为期待当然不宜与实际行为相提并论,故我们不应简单地由上述资料推论青年军人群中各种互助活动的分布。但是,不管重大互助行为的发生还需要多少条件,表 4 中介绍的情况已清楚地显示,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确实存在着可观的群体压力,使种种日常的和特殊的人际互助在他人期待和个人义务感的作用之下更易成为现实。

3. 群体内的主要人际吸引因素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部关系紧密度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人际吸引的性质与强度。导致人们相互吸引以至结群的主客观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我们依组织整合的视角只选取兴趣吸引和人格吸引这两个常见因素加以讨论。

对个体而言,兴趣与爱好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行动的质量,影响着个体对自主资源(如闲暇时间、精力、体力等)的分配。对友伴群体来说,共同的兴趣爱好不仅标志着群体的风格,常常还是群体聚合的初期驱动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趣缘特征强烈的友伴群体通常都是非常活跃的。在我军基层,凡是生气勃勃、充满青春气息的单位,必有这类的群体在其中扮演具有积极意义的前台角色。

表 5 的 G 项显示的是未分功能性向的趣缘关系的分布。在我们的样本中。称所属成员多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青年军人数量不大,尚未达到样本的 17%,即使是置身小型友伴群体,同一指标也未达到 25%。由于兴趣爱好在审美趣味上有层次之别,而能以属于较高审美层次的兴趣爱好指导自身活动的人在正常分布中又为少数,故可推断我国青年军人中由此类个体构成的友伴群体数量颇为有限,这方面的工作应予加强。

同兴趣爱好相比,人格因素在人际吸引方面的作用更见深沉有力。日常生活中,有一定人格魅力的个体多为人际交往的优先对象。他们时而聚向社会或组织的中心,时而散布在边缘

区域,并在各自的位置上制约着周围的人际关系和群体气氛,进而影响到一个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许多友伴群体之所以能够表现出久历磨难亦不衰微的内聚力,同有人格魅力者在核心发挥作用是分不开的。

表 5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的人际吸引

密度 分层	人际吸引 状态	总体水平 (%)	规模指数 (SI)	群体规模差异 (%)					
				小型 (SI)	中型 (SI)	大型 (SI)	小型 (SI)	中型 (SI)	大型 (SI)
高 G	兴趣吸引	16.6	100	22.6	100	8.1	100	12.0	100
密 H	人格吸引	14.9	100	22.1	100	6.8	100	12.5	100
度 I	长久联系	65.9	100	70.6	100	64.4	100	54.4	100
中 G	兴趣吸引	48.8	294	52.8	234	52.3	652	25.8	215
密 H	人格吸引	37.9	254	43.6	197	39.9	587	14.3	114
度 I	长久联系	18.8	29	18.8	27	22.4	35	14.1	26
低 G	兴趣吸引	34.7	53	22.5	32	39.6	62	62.8	113
密 H	人格吸引	47.1	72	34.4	49	53.4	85	73.2	586
度 I	长久联系	14.8	23	10.7	15	13.3	21	31.5	58

表 5 中的 H 项反映了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有人格魅力者在三种规模等级上的存在状况。比较起来,小型群体的中、高密度反映达到了 2/3,而大、中型群体均较松散。需要强调的是,G 项和 H 项的高密度反映十分接近,离差最大者才 1.5%。它们的存在水平再次令人考虑到,称我军关系紧密度较高的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人数不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应属较为稳健的看法。

I 项是人际吸引力的辅助指标,了解的是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成员间保持长久联系的意向。调查发现,高达 65.9% 的对象认为,他们同本群体中 2/3 以上的成员建立了退役后也愿保持的亲密关系。将 I 项高密度反映同以前诸项的同层次分布状态联系起来分析,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象兴趣爱好、人格魅力、互助期待等因素虽然都对亲密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但它们都不能唯一地决定我国青年军人对人际友谊的理解。换言之,我国青年军人建立的亲密关系具有多方向、多层次的特点。这些关系的功能与价值虽不尽相同,但它们大都为我国青年军人所珍惜。

三、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的核心角色

1. 群体核心角色的发育状态与基本角色期待

在较为成熟的军人友伴群体内,自然发生的角色分化过程最终会产生出一个或几个核心角色。这类人物的出现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意义,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军人友伴群体有了自己的首领性角色后,其内部的信息沟通控制、情感凝聚程度、行动协调水平及人际关系危机的疏导能力都会有所提升。

军队是成员流动性很高的社会组织。受这种社会流动的自然作用,青年军人非正式群体的核心角色在缓慢的发育过程中形成后,常常很快又退出军营生活,留下了较难续补的空缺。一批批地趋于成熟,又一批批地呈现残缺,和平时期军队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发育的总体状况总是受到这种流动的制约。在研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上述作用的结果。

资料显示,处在尚无核心角色的幼稚型友伴群体的青年军人不多,仅为 17.3%。但处在

已有公认核心角色之群体的青年军人也不多,数量刚刚达到 33.5%。其余 49.2% 的青年军人认为他们所处的友伴群体属于中间类型,即只有影响相对较大的角色,但没有可以称得上核心的人物。这个类型包含两种亚型,一是正处在摆脱幼稚状况的过渡形态,二是已经成熟但因人员流动等因素的影响而致核心缺失的残损形态。二者的数量如此之大,正是军队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一大特色,也是军旅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

军人友伴群体的核心角色是自发过程的产物。他们必须大体符合群体成员的有关角色期待,才能获得并保持首领或主心骨的影响力。为了解我国青年军人对这种重要社会角色的选择取向,我们共设计了 21 个指标,分别涉及基本社会前景、个体素质、人格特征三个维度,请被调查者从中选出自己心中认为最有份量的因素。结果发现,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关键特征是人格变量。将重要程度的第一、第二级合计,便得出了表 6。对它略加分析,即可勾勒出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肖像。

按进入前十位的项目比率,首重人格因素的青年军人为 61.9%。显然,信用良好、关心朋友的士兵容易赢得他人的敬重;为朋友保守个体隐密、人际关系较好、待人慷慨大方也受到不少人的推崇。表中将个体素质置于首位的青年军人占样本的 24.6%,其中军事技术好所占的比率相对最高,其他四项分别同文化修养及交往能力有关。

表 6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的核心角色期待

级序位置	角色特征	期待强度第一级(%)	期待强度两级之和(%)
1	讲信用	31.4	37.0
2	关心朋友	21.8	43.8
3	军事技术好	8.1	13.7
4	文化水平较高	4.8	13.3
5	风趣幽默	3.9	12.7
6	有文体特长	3.9	9.3
7	善出主意	3.9	9.0
8	“人缘”较好	3.4	11.5
9	能保守朋友的个人秘密	3.1	12.4
10	慷慨大方	1.7	5.9

为求严谨,我们还请被调查者谈谈他们的朋友更看重哪些特征,结果进入前十位的仍是上述项目,差别仅在于它们的先后次序。强度最突出的还是关心朋友、信用良好,其后依次为幽默风趣,“人缘好”,文化水平较高,善出主意,慷慨大方,军事技术好,能为朋友保守秘密,有文体特长。

如何看待我国青年军人对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基本期待呢?

首先应看到,进入前位的都是为我国社会所赞许或原则上予以接受的内容,由此可以推知正常的社会行为规范是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主导因素。也就是说,在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健康向上的倾向。

第二,核心角色期待有着强烈的现代青年色彩。那种对文化修养、社会交往能力、文体活动特长、幽默风趣、善出主意等项目的重视,正反映出 90 年代中国青年活泼向上、讲求修养的群体特征。

第三,军人素质受到重视。我们认为,“军事技术好”在 21 项指标中能够位于前列,决非意义轻微的现象。它说明军事专业能力的高低对青年军人人际交往魅力的大小有可观的影

响。也就是说,有着某些良好军人特质的青年军人较易成为友伴群体的核心。

第四,核心角色期待的关键成分是强烈的互助行为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可预测性。关心朋友且守信用的人能吸引他人的深层沟通与人格投入,因为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更能令人体验到某种有重要价值的稳定性和安全感。

第五,核心角色期待的基本内涵意味着首领性人物的出现将增强友伴群体的封闭性。作为主心骨,核心角色不仅有责任保守朋友的隐密,还得主动维护群体成员的某些利益。这一方面提高了友伴群体的内聚力,同时也将强化“内外有别”的群体规范。因为要分享亲密关系所能带来的种种益处,就有必要将所属群体同周围环境区别开来。假如某一群体成员“边界观念”淡化,“我们”意识强烈的核心角色便非常可能产生提示或警告的冲动。

角色期待对了解社会群体中的行为规范固然有重要价值,可它们毕竟属于观念世界。军队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青年军人在选择非正式群体核心角色时不可能处于同等条件之下。具体生活情境永远是独特的,那么,战士们在各自的境遇中到底作出了怎样的选择,亦即现实中的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核心角色有哪些特点,这显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此展开一些讨论。

2.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实际特征。

在我们的研究中,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基本特征被分作四个维度:一般社会特征,军人角色特征,人格素质和首领人格。

表7传递的信息反映了青年军人在实际择取友伴群体核心角色时的倾向性。优势选择的强度分为两级;肯定性回应应在70%以上的为第一级,第二级的范围在50%至70%之间。可以认为,被调查者关于某一特征的肯定性回应比率高,意味着该特征对核心角色的形成有显著价值,或者说具备此类特征者享有被推至青年军人非正式群体中心位置的优势。

很明显,青年军人的社会背景因素不是优势选择的聚集之所。这一维度包含8项指标,比率均在50%以下。

我们先探讨一下“两龄”(军龄与年龄)的影响。它们的大小长短同个体的长幼级序和资历直接相关。在传统社会里,“年龄优势”归于年长者。中老年人阅历较深,经验与知识的积累时间相对较长,加之保守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常常酿成了“人微言轻”、“年少言轻”的社会气氛。受此气氛制约,年长资深者更易成为友伴群体的核心。现代社会依然提倡尊老敬长,但仅因年龄差距产生的许多义务都已消失,旧日的尊卑关系以及“下从上”的单向顺从模式受到猛烈冲击。据此观之,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核心角色年龄相对偏轻,应属正常现象。

更重要的是,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核心角色资历也呈现出相对较浅的倾向。80年代以前,“老兵”在我国青年军人中是一种受到普遍重视的身分,有关角色期待较为清晰,附着的权利与义务通常都能为人们所尊重。轻率地“冒犯”资历较深者,很可能受到群体舆论的指责;而不注意“老兵”规范的资深者,也会因“不成体统”的贬议而威信受损。据了解,那个阶段的许多士兵在晋升为军官后的很长时间内,对军龄的长短依然十分敏感。80年代以来,我国青年军人资历观念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趋于淡化。刚刚进入“老连队”的第一年度兵在几个月内,“新兵”意象尚强,随后就迅速模糊。这种转变对军队组织整合的影响利弊究竟如何,需要深入研究后才能回答。

再看看地位因素的作用。表7给我们的印象是,青年军人的社区、家庭、经济、职务等方面的优越背景条件对前面所说的优势选择亦无显著制约。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城乡差别较大,城市处于社会流动的上位。城市居民享有较好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娱乐、购物、交通设施与福利待遇,但城市籍青年军人并未因之而成为优势选择的对象。与此相似,父母地位高、本人经济宽裕、社会关系较多这些在军地组织均属引人注目的家庭背景条件,也不能象它们时常主导婚姻选择那样影响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形成。同样,具有多种重要意义的班长一级职务,亦未造成对地位较高者的偏倾。对地位因素的淡漠在关于核心角色的期待中有明确的反映(7项指标的平均比率仅为0.9%)。

表7 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实际特征

角色特征因素	肯定性回答比率(%)	角色特征因素	肯定性回答	角色特征因素	肯定性回答
A、首领人格特征		B、个人素质特征		C、个体社会特征	
1、关心朋友	90.1	6、善出主意	67.9	14、城镇兵	39.2
2、讲信用	90.0	7、见识较多	61.0	15、班长	38.2
3、人际关系较好	84.4	8、军事技术较好	60.3	16、社会关系较多	34.2
4、慷慨大方	73.6	9、风趣幽默	57.3	17、年龄较大	31.6
5、能保守朋友的个人隐密	71.7	10、有文体特长	56.2	18、军龄较长	19.8
		11、文化较高	47.2	19、经济富裕	13.2
		12、较有胆量	41.6	20、父母社会地位较高	8.6
		13、会民用技术	27.8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个体素质和首领人格,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形象顿时便清晰起来。

有军队生活经验的人几乎都能轻松地将表7中的优势项目同脑海中的鲜活形象联结成一体。就基本倾向而论,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核心角色多数都能大体符合有关角色的期待:

他们有较强的人格魅力,令与其交往密切的青年军人感受到热情与温暖;多数信守承诺,涉及朋友情况时言辞谨慎;在某些时刻往往表现得敢做敢为,赢得了关系密切者的信赖;比较熟悉人际交往的艺术,在朋友圈外的“人缘”亦好;多有慷慨大方的豪爽风度;素质也相对较高,思维敏捷,有些阅历,还可能身怀一两样令人钦慕的文体技艺;此外,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双亲无较高职务的家庭,很少有可观的消费实力;资历并不一定很深,多半来自我国农村地区。

简言之,这类背景平凡的青年军人多已表现出了一定的领导能力和人际影响力。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他们构成了我军基层军官的重要来源之一。80年代以来,这些青年军人服役期满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家乡。我们相信,很多在地方上干得有声有色的复员军人,当年都曾是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主心骨”。

另一方面,这些自发产生的核心角色毕竟还是涉世未久的青年,身上有某些稚气和不足当属常态。接受我们询问的青年军人中有49.6%的人坦率指出,他们所熟识的核心角色有明显的弱点。即使不对17%的暧昧回答(即称“说不准”)深加分析,也不估量“为亲者隐”的传统风习对称“无明显弱点”者可能产生的影响,49.6%这个数值就已经不乏启动思维的力量了。当然,有些弱点虽属显著但对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其他成员作用甚微,可有些却是另一种情况。社会学的研究早已证实,首领性角色的个人风格通常都制约着群体的行为方式。我军基层工作的实践也反复表明,恰如其分地判断青年军人友伴群体核心角色的个体弱点的影响力,对提高基层领导效能有重要意义。

四、基本判断

综上所述,可以形成如下判断:

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规模多为 6 人以下的小型结构,角色构成以“纯士兵型”为主,分布范围虽有跨越团队者,但多数是以连队的社会空间为度;小型结构的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内关系的紧密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类结构,较深的情感沟通、强烈的互助期待、有力的人格吸引和保持长久联系的愿望,使这种小型友伴群体成了对青年军人角色行为和军人生活体验有重要影响的“微型社会磁场”;由于军队人员流动性大,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一般不如地方同类群体稳定,只有一部分形成了有较大影响力的核心角色;这类角色多有较强的人格吸引力和组织能力,军事技术较好,许多人都能同单位领导和同志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多数都有健康向上的群体气氛,这一研究假设也得到了调研资料的支持。

我国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这些特点对军队的组织整合具有多种重要作用。可以说,要有效加强军队基层单位的质量建设,就应积极关注青年军人友伴群体的实际状态,通过恰当的调控方法影响这些“微型社会磁场”中的自发性社会过程,使青年军人个体间的人际互动能够产生出更大的组织整合效益。

责任编辑:范广伟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成立

为促进我国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化,系统地对各种社会研究方法和技术进行探讨,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研究方法,并使之得到更好地推广和应用,“华中理工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于 1995 年 11 月正式成立,下设学术部、培训部和调查部。中心现有教授 2 人,副教授 4 人,讲师 3 人。主任风笑天,副主任刘欣。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理工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邮编 430074 年,电话:(027) 7543152, 7543252。

(陈祖桂)